

经济危机对欧洲政党及政党结构的影响

林德山

内容提要:本文以欧洲 11 个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在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国内选举中的表现为例,分析了危机对欧洲不同政党及政党结构的影响。各类政党的选举表现显示,欧洲的主流政党受到危机的冲击更大,而来自左右翼两端的更为激进的中小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得更为活跃,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结构由此受到冲击。各类政党之间围绕应对危机的政策分歧也暴露出一些可能影响欧洲未来政党政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

关键词:欧洲 政党 经济危机 结构变化 政策分歧

2007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了欧洲各国的政党及政党结构。危机对各国的主流政党提出的挑战更大,而来自左右两端的激进中小政党则显得更为活跃。随着危机的持续及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欧洲不同国家以及政党之间在观念和政策上的分歧有扩大化的趋势,影响未来欧洲政党政治趋向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

一 欧洲的政党格局

根据不同政党在现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结合政党的政治属性和

特征,我们可以将欧洲的政党大致分为三类^①:(1)主流政党,指那些代表主流价值观念、政治特色明显且保持连续性、支持结构稳定、具有被认可的执政能力或潜力的政党。按照这一标准,欧洲各国目前执政或领导执政的政党以及主要的反对党大都属于主流政党。这些政党在政治图谱上呈现左右分庭的格局,左翼主流政党基本上由社会民主党^②构成,而右翼主流政党则由自由党、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构成;(2)平衡性政党,指那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不具领导地位、但却具有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平衡能力的政党。在此,用以广义地指称那些能够通过各个国家的选举门槛线标准进入国家议会的主流政党之外的政党。但鉴于欧洲多层次的治理结构特征,少数虽然在国家层面难有作为但却在地方性事务或者欧盟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也可纳入其中。^③平衡性政党的数量主要取决于选举制度和各国的政党政治文化。一般来说,在小选区简单多数体制对大党更为有利,而在混合比例代表制下,中小政党的活动空间更大,但具体到各国也因选区的划分、门槛线的高低、有关政党联合的限制规定等不同而各有差异。与主流政党相比,平衡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构成更为复杂,结构变化更大。与主流政党拥持主流意识形态和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相比,平衡性政党在左右两端都有更为激进甚至极端的政治力量。此外,单一事务型政党——即主要关注诸如生态、移民和地方事务这些不同于传统左右政治事务的政党——及政治立场具有中间化倾向的政党在平衡性政党中发展较快。而与主流政党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同,平衡性政党的变化更大,尤其是近20年来,新党现象——指进入影响政党政府构成行列的新成员——成为欧洲政党政治中一个愈益突出的现象。新党现象在左右翼中均存在,但右翼的表现更为活跃,尤其是诉诸移民问题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迅速发展。而在左翼中,主要是强调生态问题的绿

① 这里借用了意大利学者萨托利对政党的分类,并将意识形态的因素融入其中。萨托利根据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按照政党的治理功能划分了三类政党:(1)存在于政府之外、没有进入政府的政党,可以说是使节党;(2)在政府范围内运作但没有控制政府的党;(3)实际上进行治理、具有治理和政府的功能的党。参见[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2页。

② 社会民主党,指作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政党,名称上有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不同字眼。但在欧洲,并非所有以这些名称表示的政党都属于社会党国际成员,如葡萄牙社会党属于社会党国际成员,而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则属于右翼政党。爱尔兰工党属于社会党国际成员,而爱尔兰社会党属于激进左翼政党。

③ 一些地方性政党虽然难以进入国家议会,但对特定地区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还有少数政党虽然很难在国家层次上跨越选举门槛线,但却能够进入欧洲议会,因为欧洲许多国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实行的是直接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小党有更多的机会。例如,英国独立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位居英国第二大党之位,但在2010年英国大选中虽然得票率位居第四,却未能赢得一个下院席位。

党在崛起。新党现象一方面反映了选民流动性的加大和人们对政治流动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模式不满以及新的社会政治冲突的一种表示;^①(3)边缘性政党,指上述主流政党和平衡性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党属于这类政党。从执政功能上讲,边缘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其社会动员能力却不容忽视,如在欧洲长期存在的托派组织以及极端右翼政党。

危机爆发前,欧洲政党格局大致呈以下形势:主流政党构成相对稳定,且大致保持了左右平衡;但在平衡性政党中,中右翼显得更为活跃,而左翼则明显消沉;由此使得左右翼的总体结构显示出向右翼倾斜的特征。

二 危机过程中各国政党在选举政治中的表现

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持续,强烈冲击了欧洲各国的政党。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政党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2007年以来,欧洲各国政党在选举政治中的表现表明了这一点。表1和表2以欧洲11国为例,^②分别显示了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和危机以来在国内选举政治中的表现。由此粗略勾勒了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在危机冲击下的起伏状况。

受选举制度不同的影响,欧洲各国不同政党在国家议会中的实际席位往往不与其在民众中的实际支持水平相一致,因而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的选举表现之间的可比性不足。相对来说,由于目前欧洲议会的选举在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又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因而选举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此次危机在欧洲演进的进程来看,可以把200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看作一个阶段性事件。此前,金融危机已经普遍蔓延到欧洲、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显示,因此,可以把此次选举中的选民选择看作对此前危机进程中各国政党表现的一种反应。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到2009年中,欧洲各国总体的政党结构得以保持,主流政党的支持率虽然因为危机受到冲击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下滑,但

^① Kris Deschouwer ed., *New Parties in Government, in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

^② 这里选取的欧洲11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大国、有代表性国家及深陷欧债危机的主要国家。

基本地位依然保持。除英国和荷兰外,前两位的基本上都是传统的主流政党。另外,主流政党和关键性的平衡性政党大致保持了左右平衡。

表1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部分国家主要政党表现

国家	赢得席位的前四位政党				当时的执政党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英国	保守党 ⁻	英国独立党(UKIP) ⁺	工党 ⁻	自由民主党 ⁻	工党
德国	基民盟 ⁻	社民党	绿党 ⁺	自由民主党 ⁺	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
法国	人民运动联盟 ⁺	社会党 ⁻	欧洲环保党 ⁺	民主运动 ⁻	人民运动联盟
意大利	自由人民党 ⁺	民主党 ⁻	北方联盟 ⁺	意大利价值党 ⁺	贝卢斯科尼联盟(包括自由人民党、北方联盟、自治运动)
希腊	泛希社运	新民主党 ⁻	共产党 ⁻	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 ⁺	新民主党
西班牙	人民党 ⁻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欧洲联合 ^①	左翼联合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葡萄牙	社会民主党 ⁺	社会党 ⁻	左翼集团 ⁺	民主联盟(CDU) ^②	社会党
爱尔兰	统一党 ⁻	共和党 ⁻	工党 ⁺	社会党 ⁺	共和党/绿党
瑞典	社会民主党	温和党	自由党 ⁺	绿党 ⁺	温和党、中间党、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
丹麦	社会民主党 ⁻	自由党	社会主义人民党 ⁺	丹麦人民党 ^③	自由党、保守人民党
荷兰	基督教民主联盟(CDA) ⁻	新自由党(PVV) ^{④+}	工党(PvdA) ⁻	自由民主人民党(VVD) ⁻	CDA, PvdA, 基督教联盟(CU)

注:“+”、“-”表示与上一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相比该党席位的增和减。斜体表示该政党属于中左翼阵营。表格由作者根据各国政党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自制。具体各党代表及在欧洲议会中所属党团情况,参见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ps/en/full-list.html? filter](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ps/en/full-list.html?filter)。

① 由一些西班牙地区性政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中联合提出选举名单。

② 民主联盟是从葡萄牙共产党和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

③ 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

④ 新自由党(PVV),是从自由民主人民党(VVD)中分裂出来的极右翼政党。

但该结果也表明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不同政党的影响。首先,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多数主流政党得票率或席位下降。最为惨重的是英国工党,其得票率竟然低于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独立党。这是英国工党在战后重大选举中第一次被挤出前两位;其次,与之相应的是,一些中小政党,尤其是持欧洲怀疑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表现突出,除英国独立党外,荷兰的新自由党也位居荷兰政党第二,希腊的人民东正教阵线也进入前四。左翼阵营中表现抢眼的则是少数国家的绿党;再次,从具体的政党变化来看,在主流政党中,执政的比非执政的受冲击更大,左翼比右翼损失更重。大多数国家执政的主流政党得票率或席位下降,其幅度要大于非执政的主流政党。而从左右翼阵营来看,右翼主流政党的表现明显好于左翼。执政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意大利自由人民党席位还有所增加。可在左翼阵营中,所有领导执政的政党席位都减少了。

这些变化特征也反映在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国内选举政治中。表2显示了这11个国家2007年以来的政府变动情况及各党的表现。

各国国内选举政治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显示的上述特征。不过,由于危机的持续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不同国家卷入危机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受危机冲击的程度明显不同,各国政党格局变化的具体形势也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选举的进程及结果来看,欧洲主要大国及受危机冲击较小的国家(如瑞典)的政府及政党结构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除深陷危机的意大利外,主要大国的选举都按正常的选举进程进行。但深陷危机的国家则明显动荡,不仅普遍出现非常选举,而且传统的政党结构也在变化,一些传统的大党面临危机。

第二,危机期间,除了未深陷危机的瑞典以外,所有的执政党——无论左右——无疑都面临了更大的压力。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党、希腊的泛希社运、意大利的自由人民党、爱尔兰的共和党、荷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纷纷落马。尤其是“欧猪五国”(即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危机期间的选举中,几乎所有的领导执政党都惨遭失败,甚至一些作为执政伙伴的小政党也未能幸免,如作为爱尔兰共和党执政伙伴的进步民主党和绿党,前者解体,而后者在2011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其全部议席。即使是法国和德国,萨科齐和默克尔各自领导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和德国联盟党在国内也受到了较大压力。萨科齐的离去和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的失利都显示了作为执政党所承受的压力。

第三,传统主流政党的地位进一步被侵蚀,一些国家传统的政党格局有改变的趋势。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在所统计的这些国家中,来自左右翼的传统主流政党虽然总的支持率下降,但作为大党的基本地位还保持着。而随着危机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持续,这些传统主流政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一些政党甚至有失去大党地位的趋势。如长期执政的爱尔兰共和党在该国2011年大选中沦为第三;曾经是荷兰第一大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2010年大选中沦为第四,2012年大选进一步滑落到第五;希腊的传统大党泛希社则则在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都输给了激进左翼联盟而沦为第三党。而在典型两党制的英国,也出现了战后首次的联合政府。与之相应的是来自左右两端的一些更为激进的中小政党的崛起。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荷兰的新自由党、丹麦的人民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纷纷进入前四位甚至前二位。即使在受危机影响较小的瑞典,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也第一次进入议会,并获得20个席位,超过了左翼党(原瑞典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传统的政党格局在悄然变化。

三 不同政党在应对危机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欧洲各国不同政党在危机中受到不同的冲击与其在应对危机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政策选择密切相关。在应对危机的问题上,不同政党间分歧的焦点是紧缩政策和欧盟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主流政党因为其政策选择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反对主流政党政策的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一)有限的政策选择使主流政党承受了更大压力

金融危机以来,“救市”和紧缩是各国国内政策的两个主题:一方面,各国政府乃至欧盟动用各种资源援救一些金融机构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为此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尤其是各种社会福利开支和公务人员工资。这自然引起那些生活水平下降的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政府是在为危机的肇始者买单而让民众作出牺牲。随着危机的持续,人们的不满情绪在积累和蔓延。可对于那些寻求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救的深陷危机国家的政府来说,紧缩政策是无奈的选择。缺少政策选择空间致使各国执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在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原执政党无一例外地经历了选举失败。在

其他一些国家,执政党同样也承受了较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危机以来绝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政府的更换,^①这意味着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都承受了这种压力。

欧盟的问题是涉及欧元区乃至欧盟命运的政治问题。在此问题上,相对于其他政党,欧洲各国的主流政党在援救主权债务国家、拯救和稳定欧元、保持欧盟的健康发展这些原则性问题上表示了相近的立场和更大的“责任”意识。危机以来欧盟国家频繁举行的首脑会谈及一系列成果显示了这一点。但随着危机的持续和加深,欧洲各国社会大众围绕欧盟问题的分化日趋严重,对传统主流政党欧盟政策的不满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示:在深陷危机的国家,民众对其政府屈从欧盟“苛求”表示不满;而对于欧元体系中那些净付出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也质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来填补他国政府的债务漏洞。这种不满情绪的增长导致深陷危机国家政局的不稳。在此情形下,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紧缩政策和欧盟问题上的相近立场往往成为政治稳定的关键。2012年希腊大选和荷兰大选后产生的左右翼联合政府(希腊的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荷兰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工党)都是基于他们在欧盟问题上相近的立场。目前的意大利也不排除这种左右翼的“大联合”。^②

当然,在涉及具体的援救政策及欧盟改革方向问题上,欧洲不同国家以及各国左右翼主流政党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随着危机的持续日趋表面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英国保守党的立场与欧洲大陆各国的主流政党立场之间的格格不入。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左右翼主流政党之间,围绕欧盟改革的分歧也不时显露。如德国社民党指责默克尔政府在引入欧元债券问题上的消极立场;法国社会党一直指责萨科齐政府奉行的是由德国领导欧洲的政策,强调法国要有自己的特色;荷兰工党也认为应根据荷兰自身情况逐步满足欧盟财政纪律;英国工党则指责卡梅伦政府“袖手旁观”。

在相继遭受选举失败之后,2010年之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调整政策,日益强调反紧缩政策。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在2012年竞选运动中强调反对紧缩财政,要求重新谈判“财政契约”。他认为,“财政契约”只强调财政纪律,

^① 2007年以来,在上述欧洲11国的传统主流政党中,只有默克尔领导的德国联盟党保持了执政党地位。

^② 2013年2月意大利大选,民主党领导的左翼联盟虽然取得众院多数,但未能取得参院多数。本来,如果能够与五星运动联合,可以取得参院多数,但五星运动领导明确拒绝与其他政党合作。在此情形下,此前一直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右翼组成“大联合”政府的贝尔萨尼在获得组阁授权后也有改变态度的迹象。

缺少有关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加强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他主张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克服危机,承诺引导欧洲重返加速增长和扩大就业的轨道。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也声称,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紧缩政策走得太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利用反对党的地位攻击紧缩政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从近期一些国家的选举表现来看,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策略正在为其赢得新的支持。除法国社会党赢得大选外,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民主党都在2012年的地方选举中获得进展,意大利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在2013年2月的大选中赢得了众院多数。

(二) 激进左翼力量高举反紧缩旗帜

危机以来,站在中间化的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各国激进左翼强烈反对各自政府的现行政策。他们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而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援救危机的主凶(金融机构)的同时却单方面要求民众承受危机的恶果。反对紧缩政策是这些激进左翼的共同立场。由于紧缩财政是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援救一些国家的必要条件,欧盟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民众发泄不满的目标。在荷兰,极左翼的社会党反对欧盟最新“财政契约”,反对向欧盟让渡财政主权以及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一些激进的共产党甚至认为,危机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而欧盟则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因此,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是让各个国家脱离该体系。

不过,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构成复杂,政治主张的差异很大,在欧盟问题上的立场也并不一致。法国共产党、德国左翼党虽然谴责政府现有的政策,但在欧元以及欧盟问题上表现得更为谨慎,德国左翼党对欧盟持更激进的改革立场。而从选举表现来看,激进左翼的起伏也大。除个别政党外,整体表现并不突出。表现突出的代表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它利用传统左翼大党泛希社运受危机牵连迅速滑落之际,高举“宏观调控、公民利益、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旗帜迅速崛起,在2012年5月和6月相继举行的两次选举中都超越泛希社运,一跃而为国内第二大党。但同是希腊,激进的希腊共产党却在此次大选中失去了大部分席位。在其他一些国家,激进左翼的表现也并不稳定。

(三)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迅速

危机的持续和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为突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力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它们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渲染本土民族主义,反对欧盟以及欧元体制,反对以进一步加强欧盟政治约束机制、

尤其是以主权让渡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的主张。在法国,国民阵线在经历 2007 年大选受挫后,利用金融危机开始恢复力量,尤其是在玛丽娜·勒庞接替其父出任国民阵线党领袖后也有意识地调整了策略。国民阵线利用危机大打移民、安全、就业牌。玛丽娜·勒庞对萨科齐政府关于进一步对欧盟进行财政一体化改革的主张反应强烈。她指责欧元使得法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需要准备有计划地退出欧元区,中止入境移民,成立贸易壁垒反对全球化。同时,玛丽娜·勒庞避免像她父亲那样简单宣扬恐外情绪和反犹言论,而着重于在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强调代表法国公民而非外国居住者的“国民倾向”,提出要将合法移民减少 95%,同时提出退出欧元区和欧盟。在 2010 年的大区选举以及 2012 年的大选中,国民阵线的选民支持率明显回升,都仅次于两大主流政党;在 2012 年的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创纪录地获得了 17.9% 的选票。

在其他一些国家,如丹麦、芬兰、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甚至瑞典等国,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力量也都有扩张之势,并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构成及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荷兰反对移民的新自由党(PVV)在 200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位列荷兰政党第二位,2010 年和 2012 年的国内大选中都保持了第三的位置。2010 年,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少数派政府由于得到它的支持才得以成立,2012 年 4 月又因为它反对政府削减方案而垮台。而作为疑欧派代表的新自由党的政策也进一步向极右发展,主张退出欧盟。在丹麦,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主张保护丹麦人民和家庭的自由和文化遗产,主张以限制移民的方式抵制丹麦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2007 年以来,人民党一直保持第三大党地位,在前右翼政党执政时期,它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了合作立场。而在意大利 2012 年的地方选举以及 2013 年 2 月的全国大选中,2009 年新成立的五星运动都保持了第三的位置。该党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反对欧元。在英国,各政党中最强烈的反欧盟声音来自英国独立党(UKIP),它主张退出欧盟,而且其力量在日渐扩大。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超过了当时执政的工党,仅次于保守党。在瑞典,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 2010 年的大选中第一次进入议会,并获得 20 个席位,超过了左翼党(原瑞典共产党)。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政治意识和政治结构上都冲击了现有的欧洲政党政治。怀疑欧洲的联合、强调单一民族和文化并主张通过限制移民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这些政党的共同主张。而这些主张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右

翼主流政党所吸纳。如在2011年前的右翼政党执政时期,作为议会第三大党的丹麦人民党虽没有参与政府,但在大多数事务上支持右翼政府的政策,以换取后者对其政治立场的支持。而在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也通过吸纳国民阵线观点的方式与后者争夺选民。在2012年法国总统竞选运动中,萨科齐更是以移民为主要事务,主张严格的移民政策,这引起党内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批评。另一方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一种平衡性力量的作用更为明显,在一些国家,它们往往成为左右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性力量。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人们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推动欧洲政治“向右转”。

四 危机所暴露出的影响欧洲政党政治未来发展的问題

围绕金融危机以及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及各类政党的不同反应暴露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它们将影响欧洲的未来发展以及欧洲各类政党的政治作为。

首先,围绕欧盟机制及其改革方向的争议将成为欧洲不同类型的国家间政治博弈的主要议题。

在此次危机过程中,欧盟既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其本身也成为争议的焦点。一方面,一些人把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危机的根本障碍归之于欧元体系以及欧盟体系,认为正是它们导致国家失去了最根本的货币手段;另一方面,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机国家的普通民众对欧盟既有的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满。解决欧债危机的现实需要以及欧洲社会心理的变化都意味着欧元以及欧盟体系的改革不可避免。可是,恰恰在此问题上,欧洲面临一种新的分化:是进一步加强欧洲的控制体系还是放松现有的控制体系?表面上,它似乎只是法国和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问题,实际上它也是各国主流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分化问题。不同政党有关欧盟机制及改革方向的争议显示了欧洲政党多层竞争关系:既有不同国家的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有各国主流政党与非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更有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政党与传统精英主义政党间的竞争。很显然,主流政党更倾向于维护和加强欧盟的一体化,而来自两个方向的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更倾向于消极看待一体化。

由此,出现了两个长期性的政治问题:一是欧洲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的发展视为欧洲应对全球化及后冷战时代挑战的

一种主要方式的话,那么疑欧论的增长是否意味着人们对这种欧洲方式的信心动摇?二是主流政党与非主流政党之间利益观的冲突。通过这次危机可以看出,目前对欧洲的共识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各国的主流政党之间,而在非主流政党之间,分歧越来越大。这显示了各国不同层次的群体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益的不均衡。一些社会的边缘化群体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失落者。这将是影响欧洲未来的持久性问题。

其次,传统政治方式在解决危机过程中的无能为力引发了对目前占主导的既有政治方式的怀疑,它们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作用的态度。

危机不断升级和蔓延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过去30年在欧美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方式遭到普遍的怀疑,但政治的主导方式并未因此回归传统的政府主导。金融危机之初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方式受到普遍指责,人们一度寄希望于新的国家乃至全球控制战略能够改变这种形势。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这种热情显著消退。更有甚者,在一些人看来,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大政府的恶果。而目前应对危机的普遍措施——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作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恰恰是对两种传统政治手段颠倒的运用: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增加税收是为了扩大公共开支,尤其是增进普遍的福利,而在新右翼政治中,削减公共开支又是与减税同步的。可现在的方式是既要人们多付出又要人们少收获。这样一种强烈反差导致了人们对主流政党的怀疑。在意大利和希腊,危机的关键时期都出现了一个过渡的技术官员政府,人们寄希望于它们能超越党派利益。对这种非经民选和政府组织方式,有人称之为“政治创新”,有人则认为是对民主的挑战。两种相反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现实:一方面是人们对既有的政党政府制度的不满,包括狭隘的政党利益和政治分肥;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危机人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脆弱性的一种担忧。在一些国家,对传统政治方式以及传统主流政党的怀疑导致了政党格局的明显变化。这种格局是危机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还是长期性的政治趋势,这是人们在考虑未来欧洲的政党政治时应着力关注的问题。

再次,危机引发了激进主义政治力量从意识形态到政策方式的反思。

历史的经验显示,危机往往是催生思想和政治变化的契机。此次危机同样也促动了欧洲激进主义政治力量从思想到政策的反思,主要体现为对新自由主义方式的批评和对左翼传统的重新认识。不过,由于欧洲激进主义力量本身构成的复杂,实际的进程充满了矛盾。从上述激进左翼与社会民主党的分歧中可

以看出不同激进主义力量之间的分化。一些激进左翼政党更为强调回归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但时代条件的不同、社会构成的变化意味着简单的回归传统未必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我们从危机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其中的不确定性。

在思想意识和政策方面,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打击。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当人们把更多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也受到牵连,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民主党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一度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占主导的改革取向。在反思这一教训的同时,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新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很快,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令社会民主党陷入更大的尴尬。在许多力量看来,危机是国家滥用开支、尤其是社会福利开支的恶果。在紧缩开支的主导思想下,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政策话语权,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法国,危机爆发后,社会党的一部分力量发誓要结束萨科齐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而另一部分党内自由主义力量则认为适当提高缴纳养老保险金和推迟退休年龄是应该的。这种分歧实质上显示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主要支持力量,即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的中间联盟在观念政策方面的冲突。同样的冲突也显示在布朗离职后的英国工党内部现代化派与传统力量之间。紧缩开支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也令社会民主党尴尬,因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传统支持者的社会中下层。面对紧缩政策导致的其传统支持者的福利地位的下降,它们不能不对右翼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并不能不对来自工会的一些要求作出回应,可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现实和未来的需要来看,一定的改革是必需的。

在此背景下,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政策和思想方面表示出了一些新的趋向。在政策方面,他们试图超越简单的紧缩模式,寻求多元的、适应本土需求的政策。法国社会党的一些口号也表达了这一点。而在政治意识方面,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政治智囊们在越来越多地反思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大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缺失,危机所体现的金融资本的力量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提出,要重新阐发“社会化社会”的真意,并将该理念重新树立为德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拱顶石。英国工党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对“蓝色工党”(Blue Labour)的态度也颇为耐人寻味。“蓝色工党”是英国学者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200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代指一种保守的社会主义,它将家庭、信仰和工作置于一种新政治的中心,这种新政治强调互惠、互助和团结,它是

对战后工党方式的一种替代。基于这一理念而成立的名为“蓝色工党”的工党内部压力组织声称,它是一种帮助人们过有意义生活的可持续的政治。^① 米利班德与一些蓝色工党的思想家们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在为一本表述蓝色工党立场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更大的社会干预。^②

蓝色工党运动实际上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布莱尔领导塑造的“新工党”的一种反思。“新工党”寻求的是一种中间化道路,而在一些传统力量看来,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化。它使得工党疏远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蓝色工党实际上是对“新工党”的一种再调整,它寻求通过发掘一些传统的被认为是保守的价值观念,来重新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其理念是:通过在一些领域和事务(如移民、犯罪和欧洲问题)上更为保守的立场、拒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支持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念、转向地方和民主社区管理和服务而不是依赖传统的福利国家——后者被认为过分官僚化了,工党会重新赢得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要为工党的激进主义注入一种保守主义的要素。在此意义上,它是与保守主义阵营中的“红色托利党”相对的。它们都显示了不同的思想传统在现代形势下的一种结合。但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蓝色工党运动反映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但要解决目前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还不能只停留在理念上。^③

面对这种向传统价值观和向传统社会基础回归的趋势,工党内部主张中间道路的现代化力量也在反思自己的政治策略。2011 年 9 月,工党发布的一份《紫皮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作者包括六个前工党政府内阁成员和八个影子内阁成员。这些人实际上是寻求工党现代化力量(即布莱尔派)的继承者。紫皮书的核心要点是要在反思新工党错误(如过分诉求于市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工党的政治议程。与“蓝工党”寻求赢得传统工人不同,《紫皮书》寻求重新赢得中间阶级。在一些评论者看来,2011 年大选失利后工党竞选党领袖过程中,大卫·米利班德输给其弟埃德·米利班德是现代化派受挫的表示,而《紫皮书》意味着现代化意欲重新影响党的方向。其实,两者的竞争意味着工党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者对传统与未来的认识的不确定。

(作者简介:林德山,中央编译局马研部研究员;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http://www.bluelabour.org/2011/04/01/welcome-to-blue-labour/>, 2013 年 2 月 25 日访问。

②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1/may/17/ed-miliban-endorse-blue-labour-thinking>, 2013 年 2 月 25 日访问。

③ <http://www.bluelabour.org/2012/06/13/blue-labour-2/>, 2013 年 2 月 25 日访问。